

这些年,对于一线城市居民来说,车简直成了家庭成员之一,还是极其难伺候的一位。围绕车的问题层出不穷,摇号是赋予爱车一个户口,车位是给“车孩子”买房。梁晓声笔下,一栋老楼,地少车多,为争车位,人们用上了地锁。这地锁迅速变“心锁”,锁住了几十年的老交情,也锁住了原本其乐融融的“小青楼”。

地 锁

梁 晓 声

小青楼

小青楼其实是一幢红砖小楼。

20世纪70年代初,省京剧团有位因饰演《白娘子》中的小青而著名的演员吴玥,出身不好,有可疑的海外关系,被下放在化工厂劳动改造,属于群众监督对象之列。当然,她不仅演过小青,还演过红娘、杨排风、苏三、穆桂英等角色。年轻,漂亮,扮相美,身段婀娜,小旦、花旦、刀马旦、青衣都演得出彩,时称“台上蝶”。而

她演的小青,却是人们最爱看的。虽然政治上被划入了另册,但化工厂从工人到“三结合”干部到军代表、造反派,并没谁欺负过她。也不是没谁想欺负她,当年存有占她便宜的潜念的男人那也还是有的,但都不太敢采取行动。因为,仿佛人人都将她视为共同拥有的“安琪儿”,那么也就绝不容忍某个人偷香窃玉之勾当得逞。故对她心存邪念者,也就只有痛苦又明智地心存而已。总之,化工厂的男人们都暗做护花使者,克制着自己,谨防着别人。那时她“与时俱进”的丈夫已与她离婚了。按她的想法是认命了,蛮希望在化工厂暗中庇护她的男人中找个年龄相当的结为夫妻,彻底忘记自己曾是红角儿那码子事儿,相亲相爱,默默过完低人一等的一生算了。但她的希望却很难实现——一切企图多接近她的男人,不久便会受到不同之政治罪名的批判。在那样的年代,几乎批判谁都是不愁找不到罪名的。即使

政治罪名较难罗织,企图多接近她便是一种罪名,一种具有政治色彩的道德罪名。这一罪名在当年更厉害,变成双料的了。她也万不敢主动接近某个男人,唯恐于对方于自己都大为不利。渐渐地,她真的认命了,以为自己这一辈子注定了就该成为男人们心目中精神上共同拥有的“戴罪的安琪儿”,于是也就自行将再婚的想法沤死在心里了。

吴玥是怎么也想不到“文革”居然还有彻底结束的一天,“四人帮”还有集体垮台的一天的。

1979年,她又回到了省京剧团。1982年,又开始登台演出了。专业能力毕竟荒疏了10年,正式演出怎么也得有段基本功恢复期。她是个怀揣感激心的人,前三场正式演出,场场都赠送给化工厂二十几张票。“文革”期间,省化工所被取消了,所里的科研人员都下放到化工厂的各个车间部门去了,为的是便于他们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而到了1982年,国际科技交流又被允许了,二十几张票中的一张,就招待给了一位50来岁的法国化工专家康斯坦先生。康斯坦先生既是化工专家,也是成功的化工企业家。他的父亲曾是某届诺贝尔化学奖获奖提名者,其家族的化工企业在法国广为人知,在全世界也小有名气,并且在“文革”前就与中国化工部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可以说,他是化工部也是中国的老朋友了。招待给他的票,自然是头排正中间的最佳位置。当年的“台上蝶”已40余岁了,台下依然风韵犹存,台上还是光彩照人,直看得丧妻数载的康斯坦先生心猿意马,爱悦无限。那是吴玥第三场演出发生的情况,是康斯坦先生第一次见到她饰演的小青。“台上蝶”的表演有几分使白娘子的戏份黯然失色了,尽管并不是她成心的。散场后,康斯坦先生向陪同他观看的化工厂的头头们天真地发问:“为什么我们看的是小青,而戏名却叫《白娘子》呢?”头头们一听全都笑了,一位回答道:“我们看的也不仅仅是小青啊!”另一位回答道:“眼中只有小青的估计仅仅是你自己。”

那日后的康斯坦先生迷上了京剧,一从报纸上看到京剧演出的消息,便骑着厂里配给他的自行车前去买票,并且肯定要买甲等票。厂里的头头们说他看多少场京剧都会有招待票的,他却总是大摇其头表示谢绝。当然,前提是剧中有吴玥演的角色。头头们中有人就看出了剧外的故事,暗中穿针引线。

两个月后,康斯坦先生成功地将一枚定情戒指戴在了吴玥指上,而她以特高兴的心情默许了他的做法。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女性,思想开放的速度走在国家前边。

又两个月后,康斯坦先生迫不及待地要与“小青”回法国去完婚,化工厂为他俩举行了欢送晚会,几乎全厂人都参加了。“小青”毕竟已经40余岁了,而且政治上也与大家平等了,没谁再视她为公共的心理上的情人了,没谁再嫉妒某个“垄断”她的男人了,何况那男人还是个法国佬。到那时说那时话,国家开放了嘛!所以呢,欢送晚会的气氛依依惜别,感情四溢。“小青”唱了几段京剧,许多男女争着与她合影留念。如果时间倒退回“文革”年代去,那肯定就是“阶级斗争新动向”,胆大包天的男人的下场也肯定将是自讨苦吃,吃不了兜着走。

那种人人真情流露的氛围,使康斯坦先生和吴玥深受感动。特别是吴玥,又幸福又感动,晚会结束时哭了。

她说:“化工厂是我俩的红娘,我一辈子感恩于大家。”

而某些男人听了她的话,真是另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到了1986年,康斯坦和吴玥夫妇,向化工厂捐了200万美元,在信中说明,希望用来改善科研人员的住房条件。人们明白那表达的首先必是吴玥的想法,因为康斯坦先生在厂里时,并没去过哪位科研人员的家里,所以也就不了解他们的实际住房情况。当年大多数的他们与工人们合住在老旧的筒子楼里,家家户户的住房都很小,都在楼道里做饭,共用厕所和水池,环境卫生极差。化工厂的头头们未敢将信的内容照实宣布,怕引起工人们对康斯坦与吴玥的恼怒。果真那样,对人

家夫妇不是太不好了吗？头头们只得宣布说，是为改善大家伙的住房条件人家才捐款的。此事汇报到了省市，省市里便又批给了几百万。于是，一年后盖起了一幢四个单元的6层红砖小楼，其中一个单元的住房是三室的，另外三个单元都是两室的，70来平方米。三室的比两室的多出一间十一二平方米的小屋。这幢红砖小楼的正式街道牌号是甲十七号，但化工厂的人们都喜欢叫它“小青楼”，叫来叫去的，天长日久便叫开了，整条街的人们都随之也叫它“小青楼”了。总而言之，那幢小楼以“小青楼”这一叫法而在那条街上闻名。近年有那快递人员找不到甲十七号向人询问时，别人一说“小青楼”他就知道了。

去年，“小青楼”的外墙修缮了一层保温层，依然涂刷为红色，比红砖的红色更红。而人们，却仍习惯于叫它“小青楼”。

程先生和李师傅

程先生和李师傅都是“小青楼”的老居民。

程先生程亦诚是1966年毕业于北京化工学院的老大学生，但尚未毕业就赶上了“文革”，因为在学校里属于“保皇派”组织，毕业鉴定中有一条是“不得重用”。分配到化工厂后，一直在车间当工人，直到“文革”结束落实政策，才加入到研究人员的行列，后来被留在厂里任命为副厂长了。但他并没完全丢掉研究专业，所里的某些科研项目他也参

加了，还获得过两次化工部的优秀科研成果奖。他是厂级领导干部中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个，也是唯一具有正研究员高级专业职称的厂级领导。人品好，口碑佳。50岁以后，厂里人不知从哪一天开始都称他“程先生”了。即使退休了，“小青楼”的老居民们都称他“程先生”。尤其是李师傅，称他“程先生”时，语调透着发自内心的尊敬和亲近。

李师傅李新宇是化工厂三车间的副主任，当年程先生就在三车间当工人。李师傅比程先生小几岁，是从化工学校分到厂里的。他在校期间是造反派头头、校革委会常委，厂里对他的工作分配颇重视。

否则，以他二十一二岁的年龄，根本不可能在入厂一年后就当上车间副主任。虽然车间副主任是不脱产的，但那也使年轻时的李师傅很是得意，也很牛。

起初李新宇对程亦诚的态度极不好，也可以说相当粗暴，相当歧视。

他每每这样训斥程亦诚：“你是大学毕业生有什么了不起？你给我听明白了——我，是社会主义的苗；你，是资本主义的草！化工厂也是研制农药的地方，这里的红色政治农药是专门从思想上杀灭青草的。”

程亦诚觉得他只不过是一个没有半点儿独立思想的被“文革”宠坏了的小青年，并不与他一般见识。终于有一次，程亦诚被训火了，与他顶了起来。

李新宇恼羞成怒，扇了程亦诚一耳光。·

程亦诚顿时火冒三丈，叉开五指，以其大号的手也扇了李新宇一耳光。程亦诚在校时期是校排球队队长，本就天生手大，经常打排球使他的手更大了，李新宇被他的大手扇了个跟头。

于是二人打了起来。

程亦诚高出李新宇半头，劳动使他成了一个身体强壮的人。而李新宇入厂后开会的时候多，劳动的时候少，身体方面显然处于不利的情况。那一架他们打了10来分钟，结果是程亦诚将李新宇好一顿修理，直至车间主任闻讯赶来才将二人拉开。

三车间加上徒工有20几名青年工人。耐人寻味的是，他们都默默地看着，谁也不帮“社会主义的苗”对付“资本主义的草”。

车间主任训他们：“都瞎了？为什么不拉架？看着副主任吃这么大亏无动于衷，这是错误的！”

一名青年工人解恨地说：“活该。”

“资本主义的草”时时处处都表现很低调，干活也不惜

力气，身上并没有什么“臭老九”的臭毛病，所以青年工人们并不怎么讨厌他。恰恰相反，倒是“社会主义的苗”身上那股牛劲儿早就引起了他们强烈的反感。

车间主任将程亦诚扯到一旁，小声说：“他该修理。修理也就修理了，我担保，没事儿。但是到此为止，千万别再弄出这么大动静了。”

李新宇听不到车间主任在对程先生说什么，但从车间主任的样子看，不像是说护着自己训程先生的话。

而“活该”两个字，他是清清楚楚地听到了的。用今天时兴的话来说，那两个字使他受到了震撼。他终究是个多多少有点儿内省力的青年。自打那一天起，他开始自问某些问题了，为人处世也变得低调了，不再敢动辄训斥程亦诚了。

不久又发生了一件事——程亦诚无意中撞见了他调戏吴玥的可耻行径。

程亦诚当时怒瞪着他说了一句：“你还想找修理是不是？”

他赶紧红着脸溜了。

程亦诚于是温言细语地安慰了吴玥良久，却并没揭发李新宇。

但他太担心被程亦诚揭发了呀。吴玥不仅是改造对象，还是厂里男人们的心里情人甚至梦中情人啊！他的行为是会引起众怒的，那后果比被程亦诚修理一顿严重多了。

于是他反过来经常找机会讨好程亦诚了。机会总是属于有所准备的人——尽管此话已被说得极滥，但用以言当年的李新宇，却还是闪耀其真理性的光芒。半年后的一天，程亦诚忽然胃疼，蹲在车间的角落面色苍白，冷汗淋漓。李新宇背起他就往厂医务室跑，医务室的医生见状严重，自知无能为力，催促赶紧送程亦诚去大医院。偏偏当时厂里并无闲着的机动车辆，李新宇找到了一辆三轮平板车，将程亦诚抱上车，蹬起便走。他一个人去，车间主任怎放心得下呢，急命另一青年工人跟去。结果呢，平板车上就又多了那名青年工人，使程亦诚靠他怀里。平板车蹬到医院门口，李新宇已累得汗透衣背，喘如垂命之兽。经过检查，程亦诚是胃穿孔了，医生说再迟一步，必有生命危险。他住院期间，李新宇也去探望了一次。

程亦诚说：“你是我救命恩人。”

李新宇说：“应该的。”

程亦诚伸出了一只手：“咱俩若不成为朋友，老天爷都不高兴。”

李新宇就握住他的手说：“我愿意。”

从那以后他们便成了朋友。

一年后，北京化工学院的一封公函寄到了厂里；化工学院革委会换了一茬人，要纠正前一茬人的“极左路线”——于是程亦诚的党籍恢复了；于是他人下人的日子熬出头了，成了车间党支部委员，隔年又成了支部书记，车间副主任。而由于群众基础差，也由于生产常识差，李新宇的车间副主任被免了。在李新宇苦闷极了的日子里，程亦诚给予他的劝慰比他的任何亲人都多。

一次谈心时李新宇问：“我这样的人也能入党吗？”

程亦诚反问：“为什么不能？你又不是坏人。”

李新宇吞吞吐吐地又问：“吴玥那件事，肯定是我做人的一大污点吧？”

程亦诚坦率地说：“对吴玥的不良念头，估计厂里许多男人都产生过的。你呢，由于年轻，自控力不足，所以使自己的念头变成了行为。你以后没再骚扰过她，证明你是个能够知错改错的人啊。”

见李新宇还是一副后悔莫及的样子，程亦诚又说：“对于漂亮的女人，哪个男人不想入非非呢？我也一样的。尽管我已经结婚了，但吴玥她也一度是我的梦中情人啊。”

“仅仅是一度吗？”李新宇显出了困惑。

“自从看见了你对她的不良行为，我自己对她的不良之念便少了，同情便多了。往往，只想暗

中保护她了。”程亦诚说罢，拍了李新宇的头一下，像哥哥对弟弟常做的那样。

李新宇最后说：“那我也想入党。”

程亦诚便鼓励他放下思想包袱，积极争取。

车间主任是从部队转业下来的，当了十几年车间主任了，不论是在车间里还是在厂里，都是个威望很高的人。偏偏这么一个关键人物，对李新宇的看法不是太好。

车间主任对程亦诚说：“他也想入党？等我退休后吧。”

然而4年后他虽未退休，李新宇却心想事成地入了党。

在支部欢迎新党员的会议上，车间主任首先表扬了李新宇一番，说他4年来的确变了，像换了个人似的。说4年的时间虽不算长，但在和平年代，对于一名曾是小知识分子的青年工人，考验期也是不短的，所以应该祝贺他经受住了考验。

接着车间主任话锋一转，朝程亦诚翘翘下巴说：“你能入党，连我都替你感谢他。为了扭转我4年前对你的不好看法，他没少和我辩论。”

那天晚上，李新宇喝了不少酒——他终于洗刷了当年被免职的耻辱。4年来夹紧尾巴做人，对年轻的他谈何容易。从此，又可以挺直腰杆做人了！

那天晚上，程亦诚也喝了不少酒。他高兴的是——李新宇毕竟很争气，而自己，也算是报答了救命之恩。

“小青楼”建成后，全厂人的

眼睛都盯在了它的分配问题上。

李新宇求到了程亦诚，诉说自己的家住得多么拥挤，希望程亦诚无论如何也要帮他分到一套房子。

程亦诚当时虽已是副厂长了，却不是分房委员会委员。他自己也是交了分房申请的人，明知僧多粥少，稍有不公就会闹出打破头的事来，只得委婉地表示爱莫能助。

李新宇恳求不休，以至于流眼泪了。

程亦诚最后只得说：“我一定尽力而为……”

当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请求说出了“尽力而为”四字，他无非有两种选择——或者根本不为，而后说已经尽力了，或者，当作承诺，明知困难，知难而上。在任何年代，后一种人都是少的，如今就更少了。当年的程亦诚必属于后一种人。

但怎么尽力啊？

他想不出任何尽得上力的办法来。

偏巧，几天后他收到了吴玥的信。信中夹有照片——吴玥当母亲了。而且是龙凤胎。从几张她与丈夫各抱一个孩子的照片看，她无疑正处在人生最幸福的阶段。

程亦诚忽然有了“尽力而为”的办法。那几日李新宇的恳求使他“压力山大”，实际上他特别后悔说出了“尽力而为”四字，千不该万不该的是前边还加上了“一定”二字。

他立即给吴玥回了一封长信，不厌其烦地向她“汇报”厂里的种种人事变化。估计吴玥想了解的，几乎都面面俱到地写在信中了。当然，也重点写到了李新宇的重新做人和入党。并受李新宇“委托”向吴玥表示忏悔。结尾一小段，专写李新宇家居住情况如何困难，请求吴玥给厂里写封信，替李新宇争取到一套两居室的住房。

厂里还真收到了吴玥的一封信。

她在信中写了这么一行：如果李新宇也能分到一套住房，那将是她和丈夫都很高兴的事。

结果李新宇就具有了毫无争议的分房资格。

否则，可以肯定地说，李新宇与程亦诚二人是断无缘分同时成为“小青楼”之邻居的……

那是什么？

话说2014年6月某日上午某时，程先生的老伴蔡鸣芬伏窗外望，良久不动。

程先生奇怪地问：“看什么呢？”

老伴定那儿了似的，神秘地说：“你也来看看。”

程先生便走了过去。

老伴指着问：“那是什么？”

程先生说：“那不是地锁吗？地锁你没见过？”

不知何人何时在楼前三米多宽新铺的行道上，固定了一副车位地锁，黄色的，新的，立体三角架式的。

老伴说：“昨天我在楼前看见李师傅从人行道上往下倒车……”

程先生打断她的话，教诲道：“纠正你多少次了，别再叫人家李师傅，你就是记不住！人家也是知识分子，当年人家是从技校毕业的。李师傅是对工人的称呼，你总叫人家李师傅，人家也许心里会不高兴的。”

老伴说：“我从没觉得他不高兴过呀，别人不是也都叫他李师傅吗？”

程先生不耐烦了：“嘱咐你改一种叫法你就改一种叫法！别人是别人，你是你，你与别人不一样。”

老伴也奇怪了，反问：“我跟别人怎么不一样了？”

程先生更不耐烦了：“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你也是当年的老大学毕业生，所以你叫人家当年技校毕业的人李师傅，人家心里也许就不高兴。人家心里不高兴，脸上不表现出来，你就没法知道人家高兴不高兴……”

老伴有点儿火了，顶撞道：“你有病啊？芝麻大一点事儿也非教训我啊？他在厂里不是一直当工人吗？不是以工人身份退休的吗？”

老伴说得对，李新宇确实一直在厂里当工人来着。这是因为，“文革”时期厂里分入了几批“工农兵大学生”，将他成为科研人员的路一次次给挡住了。“文革”后又分入了几批正式的大学生，成为科研人员就更没他的戏了。

但程先生对老伴的纠正也是煞费苦心而且自认为必需的事。因为，多年以来，程先生觉得他和李新宇之间一次比一次谈不拢了，有时似乎都有那么点儿话不投机半句多的意味了。程先生意识到，他俩已不再是，而且不太可能再是朋友了。只不过，双方都尽量掩饰这一点罢了。毕竟，他们都曾有恩于对方。

一次，两人不知怎么又杠起来了。

李师傅说：“你这种知识分子是既得利益者，你看问题的立场当然和我们工人阶级不一样。”

程先生不爱听，就问道：“别忘了你当年也是技校毕业生，技校毕业生在当年也算是知识分子，只不过是小知识分子……”

李新宇嘲讽道：“所以嘛，你这种大知识分子当上了副

厂长、研究员。而我这种小知识分子，却一辈子沦为了工人。你成了‘先生’，我呢，成了‘师傅’。哎，如果你们当年不拿我当小知识分子看待，那我今天也怎么都不该被称作‘师傅’吧？”

程先生瞪着他，一时不知回敬几句什么话才好。

李师傅又说：“《列宁在十月》你也看过多遍的，有一段情节你肯定和我一样印象深刻——列宁快步走入会场，走上台去，望着台下的工农兵代表，大手一挥响亮地说：‘同志们，工农兵代表同志们，我们盼望已久的苏维埃政权，它今天成立啦！’你是大知识分子，你比我更加明白‘苏维埃’三个字的意思。你和我之间的人生差距意味着什么，你不傻，自己去想吧您哪！”

程先生张了几次嘴才说出两句话：“新宇我提醒你，你只是你，代表不了多少工人。”

李新宇冷笑道：“你这么认为吗？那咱们在网上搞一次有限范围的统计？”

程先生又张了张嘴，这次没说出话来，一转身走了。

从那天起他明白，他和李师傅根本不会再是朋友了。

他在回家的路上联想到两件事。一是60多岁的李新宇从前年起迷上了健身舞，自制了一套音量颇大的音响设备，成了附近公园里一伙大妈的教练。当然也不完全是大妈，间或有中老年男士出现于舞列，某时四五人，某时六七人，从没超过总人数的十分之一。二是他某晚在公园散步时，从舞列旁经过，听到李新宇在

对他们讲话。他不由得扭头看了一眼，见李新宇倒背一只手，另一只手在胸前比画着为了加重语气。

他不由得站住了。

李新宇说：“我不喜欢你们称我李师傅，称呼得再尊敬我也不喜欢。我本不该成为什么李师傅的。我曾是知识分子，而且出身于书香门第。是因为时代对中国开了一个大玩笑，我才成了今天的李师傅的。我也不喜欢你们称我教练。教练都收费的，我可是白教。你们要想表达对我的敬意，以后请称我先生吧。现在先生不是很普通的称呼吗？你们就用很普通的称呼来称呼我好了。”

联想到以上两件事，程先生对李师傅打内心生出鄙视来了。他曾是车间党支部副书记，李新宇的入党介绍人啊。对李新宇的档案，他太熟悉了呀。李新宇的父亲是三轮车工人，爷爷是一辈子没进过省城，三年困难时期饿死在农村的农民嘛！怎么可以胡编出身欺骗对自己不了解的人们呢？太可笑了。

联想到以上两件事，程先生对李师傅的鄙视升级了，就像当年看见他调戏吴玥以后那么鄙视他了。

2014年6月的那一天，因为老伴以后应该怎样称呼李新宇的问题，程先生就又想起了以上两件事。但他又不愿对老伴讲，老伴仍处在两家关系特好的自我感觉之中，他不忍破坏她那种一厢情愿的自我感觉。老伴呢，则固执地与他辩论——知识分子不仅是一个文凭概念，还是一个文化

概念；而“先生”和“师傅”都是同样含量的尊称。

“你的意思是指他没文化咯？”程先生来气了。

“你认为他有文化吗？自打认识他，我就从没见他读过一次书，也没见他家里有过一本书。一见别人在读书，他要么把头一扭，要么说些讽刺别人的话，当他面我也敢说他没文化！”老伴也来气了。

“不许！”程先生怒吼了，像老伴在说他是一个没文化的人似的。

“我跟谁说什么，怎么说，从哪天起需要你的教导，非得经过你的允许了？我没有言论自由了吗？”老伴涨红了脸，据理力争，也仿佛尊严受到了侮辱一般。

最终，还是程先生首先缓和了语气，向老伴承认自己对她吼是不对的，道歉了，保证以后再不了。

但他仍苦口婆心近于低声下气地说：“就算我求你了行不行？以后咱们也称他先生吧！”

“也称他先生？一幢楼里住了快30年了，一向称他小李，李师傅，忽然都改口称他先生？你脑子有毛病了，我脑子还正常着呢！”

老伴又不干了。

“确实不好，让我想想，这样，咱们往后都叫他新宇吧，新宇，这样叫他更亲近了是不？”

连程先生自己也感到若称李新宇“先生”太虚伪了。

“叫他新宇我还可以接受。”

老伴终于让步了。

于是，话题又回到了地锁。

老伴说，她昨天看见李新宇从人行道上往下倒车时，问他要去干什么，他说去买地锁。

“那么，地锁肯定是他安的！”

“那是不对的！人行道本就是不该停车的地方。因为停车的地方少，谁家车停那儿也就停那儿了。他又带头安地锁，不明摆着是占公共之地为一家私有的行为吗？”

程先生离开窗前，从桌上抓起了电话。

老伴问：“你想怎样？”

他说：“我要批评他那样做是带了个坏头。”

老伴说：“别忘了你早就不是副厂长了。”

程先生愣了愣，缓缓将电话放下了。

老伴说：“你坐下。”

程先生顺从地坐在了桌旁。

老伴也坐在了桌旁。

“咱们也得买车了。钱不是早存够了吗？事不宜迟，今

天就买。连地锁一块儿买回来……”

老伴心中分明已有主见。

“不许！”

程先生又吼了起来。

“好好好，那就先不买地锁。但今天必须把车买回来，真的事不宜迟了！又不是买不起，那还拖个什么劲儿？孙子眼瞅大学毕业要参加工作了，儿子两口子不久也要从国外回来定居了，两方面都没车太不方便了……”

老伴心平气和却坚决地摆着当天必须将车买回来的种种理由：自家也早日占个车位是大势所趋，有车位的房子即使卖了也会卖个高价，听说本市的私家车也要控制了，像北京那样摇不到号就买不成了，都70来岁的人了，没辆车以后看病也麻烦……

老伴的理由每一条皆是硬邦邦的理由，事不宜迟的主张具有无可置疑的前瞻性。程先生并不反对买车，只不过不太上心。退休后，特别是过了65岁以后，他对某些事明显地缺乏应有的兴趣了——对车便是那样。

他完全放弃意见地说：“那你就和孙子商量着买吧，我出去散步了。”

也不能只聊天气

程先生在公园里遇见了李师傅。

两个做过朋友，互相都有恩于对方的男人，而且又都是年纪一大把的男人遇见了，虽然关系已早有裂痕，但双方毕竟都没撕破过脸，都在心里想，你不先跟我撕破脸我就还跟你嘘哈着——这样的两个男人遇见了，往往都是会驻足聊几句的。那时他们将那一种主动当成一种修养，一种风度，往往还暗比看谁比谁在修养和风度方面更高些。

于是他二人站在公园一处阴凉地方聊天气。

那天的天气很好。他俩除了说好，再就都没什么话可说。

他二人都觉得，在只聊了一两句天气的情况下，若谁先转身便走，不但证明谁失礼在先，而且证明谁首先不将对方当一回事儿了。

于是他二人又聊起了房价。

聊房价也聊到都无话可说时，程先生没话找话地说：“我家也要买车了，决定今天就买回来。”

李师傅呢，则抓住新的话题，建议程先生该买什么价位哪种系列的车，而不该被哪几款车的外观所迷惑。他对车

挺懂，建议也格外诚恳，一打开话匣子，就侃侃而谈起来。

程先生感兴趣的话题则是历史及时事，而这类话题是二人最谈不拢的，便只有尽量装出洗耳恭听受益匪浅的样子听着而已。就在他的耐心几乎崩溃时，手机响了，他老伴催他回家吃午饭。

“新宇，我家也要买车别跟他们说啊！”

他撇下这么一句话匆匆走了。

李师傅久久望着他的背影，一时想不明白他对自己的称呼为什么改了……

怎么会这样？

程先生的孙子程晓光从学校回来了。那孩子接到奶奶命他回来买车的电话本是十二分的不乐意的。他已考下了驾驶证，也像奶奶一样早就希望家里有车了。但他正忙于修改毕业论文，处在惜时如金的情况。

奶奶在电话中说：“再拖下去，买回车来也占不到车位了，你自己看着办！我着急还不是为了你？”

这话说到了根子上了，所以晓光不情愿也还是回来了。三口人吃罢午饭，立即出门去买车。想买车的人到了车市，几乎没有不看花眼的。他们买得起的是十五六万的车，车市那个价位的车最多，他们不但看花了眼而且很难统一意见。一会儿这个坚持买这一款，一会儿那个又主张买那一款。三个多小时后，最终由孙子行使一票决定权，才总算由奶奶

去划卡交款了。

在孙子开车回家的路上,老伴问程先生:“感觉如何?”

程先生回答:“挺好。”

“与坐出租车不一样吧?”

“那是。”

“16万多花得舍得吧?”

“舍得。”

“高兴不?”

“高兴。”

“以后到了周末,想不想让孙子开车带咱俩去郊区玩?”

“想。”

听着爷爷奶奶的对话,孙子也高兴了,得意地说:“还是最后由我选这一款选对了吧?车膛宽敞,提速快,刹车灵,性价比高,音响也不错!”

他说罢开了音响,调准了台,请爷爷奶奶听他俩爱听的王玥波的评书。

路上开始有点儿堵了。中国之省会城市,已经没有在交通高峰时段不堵车的了。

但还算一路顺利地将车开到了楼前。

爷爷奶奶和孙子,三人望着楼前目瞪口呆——楼前三米多宽的人行道上,仅仅一下午的时间便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安装了一溜崭新的、金黄色的、立体三角式的固定地锁!

程先生大为惊诧:“怎么会这样?”

老伴喃喃自语:“我说什么来着?事不宜迟,事不宜迟,还是迟了吧?”

而孙子默默关了音响,三人都变成了不会动的假人似的。

而在他们的车后响起了阵阵

喇叭声,几辆车被他们的车堵住了去路。

街两边也停满了车,根本没有可以再停一辆车的地方了。

无奈之下,孙子只得将车开入附近一个小区,往保安手中硬塞了100元钱,才在一处白线画于犄角旮旯的车位停下了自家的车。保安说那家人驾车旅游去了,估计很快会回来,只能停几天。

孙子那本就有限的高兴被一扫而光,没心情留下吃晚饭,怏怏地赶回学校去了……

夜半三更哟

是夜,老两口失眠了。

老伴侧身而卧,背对他,一动不动地说:“总共13桩地锁。”

程先生良久才说:“我就明白了。”

又良久,老伴问:“明白什么了?”

再良久,程先生索然地回答:“不说也罢。”

2014年的“小青楼”,老户只剩15家了。三居室这一单元中,老户只剩程先生他们一家了。前几年“小青楼”的三居室房价看涨,好卖,另外那些人家就都将房子卖了,添些钱买下更好的房子搬走了。他们老伴俩也动过心的,然而“小青楼”虽是幢老楼了,却地点好,交通方便,附近有公园、小学、超市,离一家三甲医院也很近,几经犹豫,他们决定接着住下去了。另外三个单元的大部分人家也都搬走了。剩下的14户居民中,郝俊臣一家也搬走了,只不过没卖房子,没租,偶尔还回来住住。说是怪想老邻居们的,所以不卖也不租。郝俊臣退休时是副研究员,这成了他心中永远的疼。但他特能忍那一种疼,很少抱怨。在李师傅等工人面前,更是咬紧牙关也不说。总有即将拆迁的消息隔一年传一阵。13桩地锁的主人们,全是对拆迁寄托很多希望的人家。而楼前那段人行道,连神仙也划分不出14个车位来。如果又有一家加入车位的占有,那13户有车的人家中就必有一家的车被“挤”下人行道去,每天都得在路边寻找“野车位”;那将会是很大的烦恼——程先生说“明白了”,指的正是明白了他家也买车了给那13户人家造成的紧张感。

两点半左右,老伴俩总算渐渐入睡了。刚入睡不久,电话骤然响起,又将他们惊醒了。老伴俩谁也不接,以为响几声就过去了。过去是过去了,几秒钟后又响起来。响了三四阵,老伴忍不住接了。是附近那小区的物业值班室打来

的，一个男人的声音冒烟带火地命他们赶紧去将车位腾出，因为车位的主人驾车从外地旅游回来了。那小区的物业有“小青楼”老居民们的联系电话。

老伴俩不敢怠慢，双双前往。

值夜班的保安板着脸问：“给白班的保安钱了吧？”

老伴俩同声说：“没有，没有。”

值夜班的保安不信：“没给钱会允许你们占别人家车位？”

站在旁边吸烟的别人家的男人将烟一扔，没好气地训斥值夜班的保安：“还他妈啰嗦，让他们快腾车位啊！”

老伴俩又都说不会开车。

值夜班的保安也火了：“都不会开车来干什么？你家会开车的怎么不来？要人玩啊！”

程先生连说：“是不是。”

老伴解释：“孙子会开车，可他没住家里。”

别人家的男人朝程先生伸出了一只手。

程先生困惑地问人家要什么？这一问，将人家问得火冒三丈了：“还能要什么？车钥匙啊！我替你们腾车位啊！”

老伴俩这才想到，孙子忘了将车钥匙留给他们。

别人家的车门一开，别人家的妻子也抱着孩子下车了，让丈夫去找保安队队长。

当丈夫的男人嚷嚷：“找他们队长有屁用啊！咱们走，回家睡觉去，再出现什么情况都是他们的责任！”

人家锁了车，搂着老婆的腰扬长而去。

值夜班的保安也嚷嚷起来：“哎！你们也不能把车停这儿啊，这不把进出的车道给堵死了吗？”

别人家的女人头也不回地甩过来四个字：“自作自受！”

值夜班的保安就将火气发在程先生老伴俩身上：“不管你们孙子在哪儿，快让他带上车钥匙来啊！”

老伴愣了愣，转身便走。

值夜班的保安又嚷嚷起来：“聋啦？哪儿去啊！”

程先生屈辱地说：“我们都没带手机，她是回家去打电话。”

结果是老伴用人家保安的手机给孙子打的电话。程先生看得分明，老伴脸上已淌着泪了。

半个多小时后孙子骑辆自行车赶到了。但车位的主人将车停的不是地方，孙子来了也还是没法腾出车位，于是保安又不得不将车位的主人从家里请来……

当老伴俩在家中接到孙子的手机通话，说已将车停在

了一处稳妥的地方，请爷爷奶奶放心时，窗外天已快亮了。

孙子说拦住了一辆出租车，直接回学校去了。忘了锁自行车，是借的。

程先生又赶紧回到那小区去找孙子借的自行车。

自行车丢了。

第二天一早程先生就往李师傅家打电话，连“新宇”也不叫了，劈头便问：“昨天，咱俩在公园里分手后，你是不是将我家要买车的事告诉了他们？”

他问得不客气，李师傅的反问也就特冷：“你说清楚，他们是谁啊？”

“就是，另外13户人家的人。”

“我有病啊我？”

“你发誓说你没告诉吗？”

“程亦诚，我对你发得着誓吗？我只告诉了郝俊臣一个人，那怎么了？犯法了？你一大清早问罪似的！”

“可你为什么要那么做呢？”

“什么为什么啊？你审问我啊？他回这边的家来找东西，我碰上他了。闲聊，东一句西一句地随口说了。哎！程亦诚，你以为你是谁啊？别人称你先生你就了不起了？你他妈一大早找谁的茬儿啊？老子不吃你这一套！”

李师傅啪地放下了电话。

程先生瞪着听筒呆如木鸡——二人都尽量互相包涵的关系，到底还是没将就下去撕破脸了。

呢?”

烦恼大了

10点刚过,交警队打来了电话,说程先生家的车因为停在了不该停的地方,已被拖到交警队的院子里去了;人家通知车主去交罚款。

无奈,又得将孙子从学校“请”回来。

程先生怕孙子年轻气盛跟人家交警队的人杠起来,相陪着到了交警队。

孙子问:“怎么是将车停在了不该停的地方呢?是停在一家饭店门前白漆画线的停车位以内啊。”

交警队的同志谆谆教导:“不是所有白漆画线的停车位都是合乎法规的停车位。有些是擅自画的,未经交警批准。”

那还有什么可辩扯的呢?只得乖乖交了200元罚款。

程先生坐在副驾的位置上帮孙子参谋着,孙子开着车在几条街道间兜来绕去,最后一致决定,将车停在了一座写字楼的地下车库。停在那儿稳妥是稳妥了,但每天得交一百元停车费。

孙子的毕业论文答辩已迫在眉睫,也不陪爷爷回家,又匆匆赶回学校去了。

程先生身心俱疲地回到家中,将停车结果向老伴一汇报,老伴哭了。

她哭着说:“一天100,一个月不得3000吗?我的退休金才每月4000多!”

他心烦意乱地责备:“你就别哭了行不行?谁叫你急着买车的

老伴流着泪争辩:“是买车买出的错吗?明明是买晚了才产生这么一堆烦恼!”

他怕吵起来,转身躲入了另一间屋。

每天100元的临时停车费他也是心疼的。孙子的答辩日刚一过去,他亲自给孙子打电话,又命孙子尽快回家。祖孙二人趁着路边的“野车位”没停满车,将车开回抢占了一个车位。“野车位”虽然是公共车位,没谁家安地锁,却都遵守着一条潜规则——谁家的车占有的时间长,基本上被认可某车位便是谁家的了。爷爷奶奶孙子心里都明镜似的知道冒犯潜规则了,但还是那么做了。不冒犯又怎么办呢?他们都自我打气地这么想——潜规则毕竟不是正式规则。

傍晚外边响起了男人和女人交替着的辱骂声。这年头,谁的利益被触犯了谁不骂啊?并不合法的利益就不是利益了吗?

程家只得将窗关上,装作听不到。

孙子有意转移话题,说自己答辩前总受干扰,明明能得优的论文由于修改得马虎,勉强通过。

爷爷奶奶却都心事重重地没搭言。

一个周末,附近那小区的物业将“小青楼”老居民家的代表一一请了去。“小青楼”没有自己的物业,化工厂出钱将“小青楼”的物业委托给了那小区的物业,算是单位对退休工人和科技人员的一种福利。

人家的物业主任亲自给他们开了一次会,说有人一再向他们反映,在人行道上安地锁是不道德的。人行道岂容私自侵占?是可忍孰不可忍,强烈要求物业勒令拆除。

物业主任为难地说:“你们也清楚的,我们只不过是你们那幢小楼的托管物业公司。这件事你们不能要求我们解决,我们也解决不了,因为我们不是执法单位啊。你们中不少人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应在公德方面有好表现。建议你们相互之间协商解决。实在解决不了,那也应该向你们厂里反映,或向有关方面反映……”

人家物业主任说后几句话时,目光望向程先生好几次。望得程先生特不高兴,几乎想站起来大声表清白:“我又没向你们告过状,你看我干什么啊?”——但一想到“此地无银三百两”之典故,克制住了冲动。

散会后,那13户的代表,清一色13个中老年男人三三五五亲亲近近地走回家路上,谁也不搭理他。有的边走边互相嘀咕,有的还边走边回头看。似乎,13户人家预先都知道开会内容,也予以高度重视,所以出席的都是户

主。如果李师傅终究算不得知识分子,那么知识分子便只有程先生一人。

程先生一回到家里就坐下去闷声不响地吸起烟来,他破戒了。而老伴在看一份车险说明书。

他突然说了一句:“再把车卖了!”

听来分明是气话,老伴没理他。

第二天是星期日,大学快放假了,即将毕业的孙子带着些送人没同学爱要、扔了又觉得可惜的东西回来了。小伙子进了门,刚放下东西便用目光四处寻找,最后操起拖把冲了出去。老伴俩看出有情况,程先生追出了门,老伴站在窗前,探出上身大叫孙子的名字。

孙子进门之前先看了看自家的车,发现前后车盖都被划出了深深的道子,一只车轮也被扎瘪了。

那青年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拄着拖把,眼望着另外三个单元的某些窗子破口大骂。情绪失控,居然骂出了一句“十三只王八十三只龟”。这下犯了众怒,另外三个单元有好几家的窗子开了,几个男女老少也站在自家窗内对骂起来,其中便有李师傅的身影。

李师傅指着吼:“再指桑骂槐地骂我们,我出去揍扁你!什么鸟知识分子,黄鼠狼下地鼠,一代不如一代!”

程先生当街与孙子拉拉扯扯,扇了孙子一耳光才算将孙子拽回了家。

老伴不禁长叹,幽幽地说:“一步没赶上,步步赶不上,可怜咱家那车,正要为它上保险。”

派出所接到报案派来了两名民警,为那受到伤害的车照了相,也到程家了解了情况,记了笔录。

一名民警说:“类似案件不少,有的很快就破了,有的很长时间也破不了。你们要有耐心。关键问题不是我们的破案能力,是咱们这条街上没安摄像头。”

另一名民警说:“究竟是有人因为你家占了人家的车位而进行报复,还是有人因为怀疑你家人告了什么状而泄愤,这也是目前不太好推断的。”

他们一走一个月内没了下文。

老伴本想去问的。有次已走到门口了却没出门。程先生也没劝阻,她自己就嘟哝着说没意思了。

一个月内程家去把车修好了,花了几千元钱,也为车上了险。但刚从自己钱包里花出去几千元钱之后才上险,老伴觉得那几千元钱花得实在冤枉,回家后心疼得心口痛。

就在这时,程先生平静地说:“咱把车卖了吧。我怕不定哪天又会惹出什么更不好的事来。”

见老伴不作反应,隔了一会儿又说:“我现在头脑是清醒的。”

孙子表态道:“同意。我现在一想到一看到那辆车,心情就变坏。‘野车位’咱们占不长的,除非把车停在那儿永远不开走。一开走,别人的车立刻就占上了。现在,连路边的车位也都写上姓氏了。咱家人能那么做吗?不能吧?”

程先生说:“对。不能。”

孙子也就不管奶奶什么态度,当天将车开到二手车市去了。

不久车卖掉了,赔了两万元。

事情并没完。厂里的领导派来了工会的两名同志,一男一女。为了使市里的空气质量变好点,化工厂已迁到郊区去了,工会的同志来一次挺远的。他们说是专为解决地锁引起的矛盾而来的,逐家逐户了解情况,最后出现在程家。

工会男说:“现在化工行业竞争激烈,领导们压力很大。住在‘小青楼’的都是当年厂里的有功之臣,也都是有修养的人,希望以和谐为重,也希望体恤体恤厂里的领导们,别因为一点儿小事三番五次地写上告信,分散他们的工作精力……”

工会女说:“不都是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得太快惹的祸嘛!但也证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呀。那段人行道虽然在‘小青楼’的铁栅栏外,地皮却是单位的。由咱们‘小青楼’的老居民们占据了,总比被后买房的、租房的、不相干的人占据了好是不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嘛!您程先生曾是厂里的领导,德高望重,就想开点,包涵点

儿,别再跟他们一般见识了。他们都是工人,您是知识分子嘛……”

程先生起初还听得偶尔点头,听到后来翻脸了,一拍桌子抗议道:“别跟我说那些不三不四的话!我又没给厂领导们写过上告信,你们对我说不着那些,我也用不着你们谆谆教导,谁写的信你们跟谁说去!……”

他搞得工会的两位同志狼狈而去。

事情还没完。区里也来过一男一女两位同志,说是区长派来的。因为区长也收到了多封上告信。

连程先生的老伴也反感透顶了,他俩装作听不到敲门声,干脆没让区里的同志进家门。

否极泰来

钱真是好东西,很容易就能使人从倒霉中重新高兴起来。

孙子的爸妈从国外回来了。两口子在国外开了十几年中餐馆,挺成功,挣了不少钱,经济上发达了。他们听父母公婆和儿子诉苦似的谈起关于车的种种事,相视而笑,都没来气,像是在听好笑的别人家的事。

儿子说:“既然在这儿住得不开心了,那就搬走呗,明天全家一块儿到处看看房子。”

儿媳说:“爸妈帮我们把儿子带大了,操了不少心,辛苦了,应该住得更好些,享享福。车会有的,摇号难不住咱们。咱们的车得有车库,而不是路边上的车位。”

中秋节前一天,程家从“小青楼”搬走了。没谁送,也没向谁告别。他们住进了连体别墅,有车库,有花园。不久儿子开回了一辆“宝马”。虽然是合资的,那也是高档的。他们在“小青楼”的房子并没卖,也没租。老伴期待着拆迁,程先生对“小青楼”仍有感情,还想自己常回去住住。他对“小青楼”的感情,其实是对吴玥刻骨铭心的感情。当年他成为车间副主任,曾与吴玥有一段带给双方饱满欢愉的肉体关系。那是只有天知地知他俩知道的秘密。他是全化肥厂唯一一个得近吴玥芳泽并享受过与她做爱的美妙之境的男人。以此而论,当年的他也算得上色胆包天了。如今,越老就越忘不掉吴玥印在他头脑中的模样了。

网上出现了与“小青楼”有关的一段视频新闻——雨后,那一段安装了一溜地锁的人行道突然坍塌,有辆私家车被陷入窄长的地坑里了,当时李新宇在车中。他从车内开不了车门,也就无法出去。等吊车连人带车吊出地坑,他已由于严重缺氧导致心脏病死去了。

程先生老伴俩看过视频后,又都有点儿伤感。在老伴那儿,是因为曾经的好邻居关系。在程先生那儿是因为——没有李新宇调戏吴玥那件事的发生,那么吴玥后来肯不肯与他有那么一段关系就难说了。他对李新宇这一种感激不亚于对救命之恩的感激,只不过得埋藏在内心里罢了。

他说:“我想去参加他的追悼会。”

老伴说:“那也得他家属主动通知咱们啊。”

李家没谁电话通知他们。

但李新宇的女儿李萱亲自找到了程家的新家。

李萱一坐下就哭了,请求老夫妇俩参加她爸爸的追悼会。

老伴俩同声说:“一定,一定。”

李萱又请求程先生在追悼会上致悼词。

程先生犹豫地问:“由我,合适吗?”

李萱说:“您是他入党介绍人,又当过副厂长,没有比您更合适的人了啊。我老爸一生爱面子,您就最后给足他一次面子吧。”

人家女儿把话说到这份上,程先生便也答应了。

李萱接着要为父亲和程先生冰释前嫌。

她说:“程伯伯,您对我父亲缺乏理解。人啊,谁不是越到老年,越认为自己人生最风光的时候好呢?可怜我父亲,做梦都想出人头地,而他人生最风光的时候,也就‘文革’中那么一小股劲儿。他说那时候好,别人听了都不跟他辩论,偏您总认认真真严肃地和他掰扯。如今像我父亲这样

的人不老少,你能一一跟他们掰扯出个结果吗?”

程先生就内疚地说:“你批评得对,批评得对。”

老伴也替他说:“掰扯不清,掰扯不清。”

李萱又说:“我父亲生前对您也猜疑错了——他以为准是你不断东告西告地找我们13户人家的麻烦,他们也都是这么猜疑的。但后来搞清楚了,事实证明不是您……”

“那是谁呢?”

“郝俊臣呗。”

“他?不会吧?”

“就是他。每次寄的都是匿名打印信。他家不是不想卖房子,其实特想卖了。只不过想卖有固定车位的房子,有固定车位的房子房价高不少呢。一旦动迁,补偿费也高不少。所以他总想把既成事实改变了,闹出个重新洗牌的结果,他好趁机实现自己家也安上地锁的目的……”

李萱披露的真相,令程先生顿觉一阵冷气袭脊。郝俊臣——那位举止斯文,逢人先笑的自己的同类,肯定明知自己成了13户老居民所憎恨的人,在他面前却从没表现过半点儿的良心不安。过年过节,还一向主动给他打电话致以问候!

“我认识李新宇同志已四十余年了。我和他曾经是朋友……”

李萱走后,程先生铺纸研墨,用毛笔写起悼词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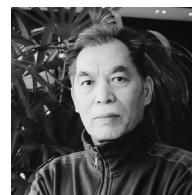
“可他人生最风光的时候,也就‘文革’中那么一小股劲儿……”

程先生耳边响起李新宇女儿的话,顿觉李新宇确实很可怜,遂将“曾经”二字圈掉了……

原载《十月》2015年第2期

原刊责编 赵兰振

本刊责编 杜凡



作者简介:梁晓声,男,作家,北京语言大学教师。曾是知青,创作之初以知青题材小说为主,后转向广泛的现实题材,兼及散文、杂文写作。

创作谈

梁晓声

我家有一辆“广本”,已经开了十来年了——我和儿子都不会开车,一直由老伴开的。

我家住在一个老小区内,所幸有车位,故并不曾受到车位问题的困扰。但由车位问题所引起的种种矛盾、纠纷,我亲见过不少。我们有的同胞素质不是差的问题,直接就是毫无公德,心性极坏的。我在《紧绷的小街》一文中写到这样一件事——有位车主,因车位问题气不顺,于是将自家车停在小街正中,造成9个小时的堵塞,而自己吸着烟,站人行道上事不关己似的看热闹。

我每想,对于此等中国人,说服教育的作用是不大的,似乎应像早期的新加坡那样,实行当众鞭笞方能以儆效尤。

然我创作《地锁》,却不仅仅是要反映车位的问题。

我觉得,我们不少的国人,仿佛内心也有一把地锁,锁住的不仅是方方面面的自身利益,同时也锁住了人类尚未进化以前的动物本能,故而在基因上难以与时俱进为现代人。

据理而言,人坚守自身利益寸步不让,即使不可敬,也还是有几分可能理解——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成为公德

之心大于私心的人。

但我的眼看到,十年河东,十年河西,自从“文革”以后先前的阶级地位之“秩序”被乱象丛生的“商业时代”颠覆了,许多国人内心里的地锁,不但锁住了当下的自身利益,也还锁住了从前之“阶级社会”时代的恩怨情仇;尽管那锁已锈迹斑斑,却绝不打算除掉似的。

于是我写《地锁》时的笔,便自然而然地由现在伸向了从前……

2015年4月10日

北京